

日本当代佛教与 政治

高洪 著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112
B93
607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日本当代佛教与 政治

责任编辑：黄金山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 强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高洪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1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ISBN 7-5060-0549-2

I. 日…

II. 高…

III. 佛教-关系-政治-日本-当代

IV. ①B94②D7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2814 号

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

RIBEN DANGDAI FOJIAO YU ZHENGZHI

高 洪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2500 册

ISBN 7-5060-0549-2/B·65 定价：8.00 元

日本佛教的新起点

——代序

杨曾文

高洪同志的博士论文《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在出版之际，希望我写个序。他所研究的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而且有相当难度的问题，在1993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又参照答辩委员会诸位教授的建议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现在最后定稿。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我想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

只要对日本历史发展的进程作粗线条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以后直到19世纪明治维新，每当日本的历史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刻，都伴随着宗教的显著变化的现象。可以说在东亚这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情况是由日本特有的社会和历史的環境所决定的。让我们对以往的日本历史进程作简单的回顾。

在佛教传入不久，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以摄政身分执掌朝廷大权，下令“兴隆三宝”，在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要求臣民“笃敬三宝”，说佛教是“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确立佛教对施政、教育的指导地位。“大化革新”使日本迅速跨入封建社会，

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封建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改革前夕，孝德天皇下诏兴隆佛法，任命十僧担任“导师”，把兴隆佛教作为实施政治革新的先导。因为在当时统治者的心目中，佛教不仅是能给他们带来现实利益的宗教，而且是大陆先进文化的复合体或代表，要推进日本社会的进步必须首先兴隆佛教。确实，当时的僧人，特别是到隋唐学习过的留学僧除了传教外，还向日本统治者介绍中国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他们与到过隋唐的留学生为建立革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决定了以后佛教在日本社会文化领域的领先地位。因为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神道在教义和礼仪等各个方面都很朴素，远远不能与佛教相比，不得不处于佛教的依附地位。

公元9世纪以后，以土地国有制为前提的班田制逐渐破坏，封建领主经济进一步得以确立和发展，直接经营庄园，控制农民的武士阶层兴起，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逐渐取得支配地位。13世纪正式确立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士统治体制。伴随着这一过程，在佛教中相继建立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佛教新宗派，又从中国新传入禅宗，标志着日本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奠定。新宗派的建立不仅削弱了原来依附朝廷贵族的旧有佛教的势力，也为武士、平民提供了新的精神依托。它们在开始的时候虽然不为幕府和武士上层所理解，甚至受到压制，但在传播中逐渐得到更多武士的信奉。至于禅宗，特别是临济宗，先后受到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崇信，为建立武家文教制度，树立武家道德风范，发挥很大的作用。禅僧在传授禅法之余还把程朱理学介绍到日本，对以后儒学的独立和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后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是经历了以上的历史过程，使得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意识到佛教是维护统治的可靠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势力。17世纪德川幕府在镇压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过程中，便利用了在各地和各个阶

层民众中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佛教。幕府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使佛教各宗建立了从本山到各个基层寺院的严格的“本末”制度；授予佛教寺僧以监督各地居民的特权，通过所谓“寺请”制建立了寺院与信徒之间强固的“寺檀”关系。虽然此时儒家已经脱离佛教而独立，一些神道学说也已提出摆脱佛教的理论，但是佛教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占据相当于“准国教”的支配地位。然而到了幕府后期，佛教界风气日益败坏，由于儒家的强大和国学派中“复古神道”的崛起，佛教越来越受到各个阶层的强烈批判。复古神道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古天皇制，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其“国体皇位”尊严无上，在伦理方面提倡孝顺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成为以后明治维新所依据的重要理论之一。

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但却是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进行的。维新政府为提高天皇的神威，维护以天皇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的统治体制，借用复古神道的理论，积极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在开始阶段借发布“神佛分离令”和“三条教则”等，宣布实行“祭政一致”，以神道为国教的政策，但遭到来自佛教（包括信仰佛教的广大农民）和支持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外国势力的激烈反对，此后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信教自由”，并且在1889年发布的《帝国宪法》中规定有条件的信教自由。然而在实际上却是改行变相的神道国教化政策，即在形式上废止神社神道的“宗教的”机能，宣称神道不是宗教；规定神官是由内务省统辖的国家官员，不得从事教化和丧葬仪式；一切神社和神官只有实施“国家祭祀”的职能；天皇在宫中执掌最高的祭祀大权；规定“敬神忠皇”，参拜神社是国民必须遵守的义务。这样，神社神道以超越一切宗教的形式成为日本的国教，教派神道和佛教、基督教处于它的从属地位，必须在它所容许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内推行法西斯高压政策，对

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利用神道进行思想动员，欺骗国民，在占领地也建立神社对当地民众进行奴化宣传。各教之中虽也出现对神道国教化，对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策提出异议者，但总的说来是尾随国家神道之后高唱“三教会同”、“护国”、“思想善导”等口号为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服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综上所述，（1）在古代，日本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与中国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当时日本特有的文化环境，佛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成为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而且在日本社会的宗教教化和文化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日本历史上的重大变动时期往往与佛教的传播、演变发生密切关联。（2）明治维新在政治上是要推翻幕府统治，确立在天皇制下的资产阶级政府，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和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便借用复古神道的学说在“王政复古”、“祭政一致”的口号下实施维新政策，在宗教上把尊崇天皇为“人格神”（“现人神”）的神道奉为事实上的国教。这是近代日本带有封建性残余的表现之一。（3）近代神道取得“国教”的至高无上地位是对古代佛教占据“准国教”地位的反动，是由日本历史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日本的以佛教、神道为主要二极的宗教格局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结。

二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在以建立工业化基础和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内容的现代化（日本称之为近代化）方面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的，但是由于推行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这一

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局限，并且在此后对外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时停顿下来。战后，美国占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对日本实行了强制的民主化改造，在经济上协助日本“自立”和发展民用工业等。随着日本经济在 50 年代后期的恢复发展和民主化改造的基本完成，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宗教方面，1945 年盟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永久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清除阻止日本国民民主的障碍，实现言论、宗教以及思想自由。此后，《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第一号文书》提出立即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并应停止对国家神道的援助，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美国占领军总部在日本发布很多废除军国主义和实现民主化的指令，其中对宗教界影响较大的有：（1）1945 年 10 月的《人权指令》，命令废除一切限制政治、社会 and 宗教自由的法律，据此在 1940 年发布的强制宗教团体合并的《宗教团体法》也被废除，此法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2）同年 12 月的《神道指令》，禁止国家对神道的保护、援助；禁止利用神道进行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废除内务省中的神祇院；保证信教自由；实行政教分离。由此神社神道的国教地位被废除。在这种形势下，1946 年初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向日本人民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人格神。

日本政府按照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指令制定了新的宗教法令。1945 年 12 月发布《宗教法人令》，规定一切宗教派别和神社、寺院、教会皆可通过制定规则向政府管理部门登记而得以成为宗教法人。1946 年颁布《日本国宪法》，明文规定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由于《宗教法人令》过于简单，凡申请登记者皆可成为宗教法人，享受免税的特权，所以一时间宗教法人激增。1951 年又公布《宗教法人法》，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具备从事宗教活动的物质条件和作为宗教团体的法律能力，并且在向政府部门提交申请

书、规则和有关证件，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核认证之后，才能成为宗教法人。还要求宗教法人必须设置 3 人以上的负责人，并由其中 1 人作负责人代表。这一法令对战后日本各个宗教团体的改组、设立和实行民主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以上各项指令和法令条规的实施，日本各个宗教派别得到并行平等发展的机会，开始了各自发展的新时期。

二战后的日本佛教，既失去了古代那种“准国教”的优越地位，又摆脱了依附国家神道的地位，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生存和发展。无论是其中的传统佛教宗派，即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存在的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真宗、日莲宗、临济宗、曹洞宗和奈良诸宗等，还是佛教新宗派灵友会、立正佼成会、创价学会等，都存在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条件，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

从总体来说，传统佛教宗派虽再也不能像古代那样受到国家的各种保护和优厚待遇，但因为曾在很长的时期内占据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对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产生过深刻影响，并且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它仍然是对日本社会各界和民众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的精神力量和社会势力。特别是净土宗、真宗、日莲宗、曹洞宗等与民众的关系尤为密切。

在江户时代确立的各宗本山与末寺之间的本末制度、寺院与信徒之间的寺檀关系，在近代以后已经开始削弱和破坏。战后由于各种体现民主精神的宗教法令的公布，伴随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而招致的人口流动和向城市集中，旧的家族制度的瓦解，本末制度和寺檀关系已基本消亡，但是它们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某些宗派虽有很多大的寺院脱离原来的本山而独立，然而又形成了类似本末制度的新的宗派团体制度。各个寺院与旧有信徒之间也有着传统的比较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传统佛教宗派

在战后能够比较迅速地修复被战争焚毁的寺院，恢复和发展教团，开展各种宗教活动。

寺院拥有的大部分土地虽然在 1945 年到 1946 年的农地改革中被国家廉价收买转卖给农民，但由于各派较大寺院从国家无偿借用或廉价转让寺院境内的国有土地和原来代为保管的国有山林土地，仍可利用这些土地进行经济开发，作为寺院经济的一项重要财源。各派寺院利用寺院及其周围的环境开办各种经济事业，包括：经办社会福利事业，如幼儿园、保育所；受国家委托开设收容盲儿、弱智儿童的教养设施，开办养老院等；开办各类学校；经营旅游观光业，开设旅馆、饭店。但是作为传统佛教寺院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财源是经办信徒的丧葬仪式，安葬死者骨灰，经营各种法会。

传统佛教各派战后长期所面临的问题是随着旧的寺檀关系的瓦解，社会价值观念 和家庭观念的变化，信仰虔诚的信徒越来越少，民众特别是中青年对于传统佛教的教义不仅很少理解，而且不感兴趣，除了按照传统习惯到寺院参加亲族的丧葬仪式和纪念法会外，与寺院的关系相当疏远。为了增强信徒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仰，培养新一代的传教人才，密切各派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振兴各地的寺院，并且扩大各派在社会上影响，各派都开展了各种名目的传教“运动”，如真宗大谷派的“门信徒运动”，真宗本愿寺派的“门信徒运动”，净土宗的“手拉手运动”，曹洞宗的“一佛（释迦佛）二祖（道元、绍瑾）奉祀运动”，日莲宗的“护法运动”，天台宗的“照一隅运动”等等。然而所收到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以至于现在人们仍以“丧仪佛教”来形容日本传统佛教徒具形式，失去生气的现状。各宗今后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在教义、传教方法、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成为能够吸引社会民众的教团，现在不仅是各宗当局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佛教学者正

在注意并且进行探讨的问题。

至于佛教系的新宗教宗派，因为成立时期短，自然不具备上述旧有佛教宗派的优势，但是它们也具有传统佛教没有的优势。它们在教义上注重把某些佛教理论作出新的解释，使之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以便于民众理解和接受，修行方式简单易行，此为其“现实主义”；僧俗一体，在家与在寺无别，提倡居士佛教，建立便于普通民众参加的组织系统，经常按基层组织开展讨论教义和交流信仰心得的座谈会，此为其“在家主义”；既礼佛，读经，又祭拜祖先，忏悔灭罪；将佛教说教与现代价值观念、日常生活伦理密切结合，把个人道德修养与净化社会相连接；开办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有的教派在开始阶段重视利用巫术、信仰治病等方法吸引信徒。各种新佛教宗派在战后初期利用人心动荡不安，很多人感到精神空虚，国民生活贫困，农村民众大量涌入城市而思乡心切，传统教派忙于重建和恢复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得到迅速发展。

在佛教系新宗教中属于日莲宗法华信仰系的教团最多，教势大的有灵友会、立正佼成会、创价学会、佛所护念会、妙智会等。此外有属于真言宗系的真如苑，天台宗系的孝道教团。还有吸收神道、佛教和基督教思想而成立的 PL 教团、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天照皇大神官教等等。

在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下，宗教团体如何进行政治活动，是各教必须正视的问题。佛教各个新旧教团及其僧人在战后的不同时期开展了各种政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佛教各个教团的当局对于在战时全力迎合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国内外政策，配合支持战争的罪责，在国内外民主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忏悔；传统佛教各派联合组成“全日本佛教会”，参加国际佛教组织及其和平活动，宣言维护世界和平，反对

战争；推举代表参加国内的议员选举，根据自己的利益支持某些党派；很多僧人参加五、六十年代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创价学会组织政党参与政治，组成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明党；围绕靖国神社国有化的斗争；积极推进日中友好的佛教文化交流的活动……，当然其中也有佛教界的人进行过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活动。当人们对于这一切进行回顾的时候，不会感到佛教界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孤立的，而是在战后日本丰富多采的政治舞台上活动着的各种内外社会势力演出场面的组成部分。

日本佛教在经历了 1400 多年之后，在二战后面临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条件，新的机遇，各个宗派进行了新的分化、改组和发展，并且与不同的社会势力结合从事各种政治活动。这确实是日本佛教发展的新的起点。日本佛教在其僧人所受教育的水平、寺院和其它传教设施、组织和传教方式、专门教育机构之多等各个方面，都是亚洲最现代化的。它今后将如何发展，发展成什么样子，是人们非常关心的。

三

日本学术界一般把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的历史作为近代史，而把战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中国史学界一般把明治维新至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日本历史作为日本近代史，把此后的历史作为现代史，而把战后的历史称为当代史。高洪《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所说的“当代”即是日本战后的时期。对于战后日本的佛教情况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确实值得进行研究，而以往我国对此研究很少。高洪的选题是有学术价值的。

前面所述是我在研究日本佛教史过程中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问

题，仅粗略地谈了谈我的一些想法，没有展开论述。高洪同志《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对于战后日本佛教和政治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论述，是写得比较好的一篇学术论文。在结构上以历史的铺叙为基础，对日本传统佛教和新兴佛教宗派在战后的发展情况及其社会政治活动、佛教的现实影响和从事政治的渠道与方式等等，进行考察、分析和论述，层次分明，脉络清楚。战后日本新宗教的异军突起是具有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在对佛教系的新宗教作了综合介绍之后，着重对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特别是创价学会作了详细的考察和介绍，其中利用了在日本实地考查得来的资料，传递给人以新的信息，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中肯的。日本政党和政治家为什么要利用佛教，是如何利用佛教的？佛教宗派是如何参与政治的？这也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本文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论述。

中国学术界对自己的邻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较少，对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古代历史和文化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很大。日本对中国的佛教和历史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而我们对日本的佛教、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都比较少，与我国的地位不相称。笔者作为佛教研究者非常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对日本佛教文化进行专题的、断代的、综合的研究，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应当指出，高洪同志《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是对日本当代佛教研究的有益的初步尝试，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见解和基本资料线索。当然书中也难免有考察不周，论述欠当的地方，这有待于今后收集新的资料作进一步研究来加以修改补充。

热诚地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日本佛教研究著作问世。

1994年4月24日于北京南方庄公寓

序 言

[日] 末本文美士

佛教于6世纪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当时，处于文明落后阶段的日本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不断摄取来自大陆的高度文明，及至7世纪佛教已在日本取得了宗教领域的主导地位。此后，佛教顺应日本风土民情，与日本民族心理相互调适，经过古代、中世纪，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对政治生活、社会状态亦产生很大影响。然而，16至17世纪时，佛教的巨大影响力衰落下来，在幕府体制下，从属于世俗政治权利的统治。19世纪，日本结束锁国，实行开放。明治政府建立后，西方科学文明以及基督教传入，迫使佛教开始近代化历程。然而，当日本逐步走上侵略战争道路，佛教界尽管尝试过一点点微弱的抵抗，但就总体而言，基本采取了支持侵略，积极向殖民地布教的态度和做法。

1945年，日本战败，着手建立新型社会。佛教教团反省过去，为建设和平的现代社会而努力。尤其是与传统教团交相辉映的佛教系新兴宗教的活动极为活跃，其中创价学会建立起独立的政党——公明党，直接问鼎政治事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达到顶峰以后，今天人们逐渐把关注的热点转向精神问题，有理由认为今后宗教发挥的作用将会不断增大。

不过，就宗教研究本身来看，日本古代、中世纪的研究如火如荼，而近代、现代的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现代，虽然近来新兴宗教的研究得到加强，但佛教整体的研究仍属落后状态。相关的信息、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而如何整理使之系统化依然是目前面临的问题，对现代佛教的评价也未有定论。本书对这一日本学术界的研究尚不充分的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努力得出全面的概括性认识，是一部对我们日本学者也很有参考价值的好作品。

1992年4月至1993年3月，作者高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学术交流协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于第三学年来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研究科接受我的指导。高洪留学日本之前，曾为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担任翻译，具有娴熟的日语能力和必备的专业知识。交流协定规定留学安排在研究生院第一至第二学年，但因高洪在第三学年留学，所以必须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进入论文撰写阶段，预定在归国前完成论文。而现代日本佛教研究这一主题在日本学术界尚属研究很不充分的领域，严格的时间限制曾使我略感不安。

然而，高洪面对艰巨的课题十分努力，在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高堂晃寿等青年研究人员的协助下，迅速推进研究工作。并同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来日担任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的中国方面指导教授杨曾文先生取得联系，接受了多方面指导。终于在1993年5月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用特快专递寄至我所在的东京大学。这篇论文结构整齐严谨，对日本佛教与政治诸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93年5月26日，我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中日双方共同主办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会上高洪以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对课题相关的各种难题作了精采的答辩，全体答辩委员高度评价了他的论文和答辩内容，一致通过

授予博士学位。

今天，这一论文即将出版成书，引起了众多研究者和关心日本问题的人士的瞩目，令我不胜欣喜。目前，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十分关注日本的经济、社会问题。相形之下，日本宗教问题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为了不仅仅从表面，而是从更为深刻的内部了解日本，宗教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不可缺少的方面。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提高对日本宗教问题的关注，带动更多学人立志研究这类问题，必将会促进中日两国间真正的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1994年7月20日于日本东京大学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ISBN 7-5060-0549-2



9 787506 005494

ISBN 7-5060-0549-Z/B·65 定价:8.00元